库尔班江：让大家看到一群真实的新疆人

库尔班江·赛买提

本报记者　吴晓东

“其实新疆人和北京人、上海人、山东人没有什么两样。”在北京南礼士路附近一家僻静的咖啡屋里，库尔班江·赛买提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这位出生在新疆和田的维吾尔族摄影师，在他32岁那年，突然成了中外媒体追逐的焦点。2014年10月，他在自己的新书《我从新疆来》里，图文并茂地讲述了100名在内地工作生活的新疆人的故事。这些书中的主人公包括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等十几个新疆的主要民族。

眼下，同名系列纪录片正在热拍中，而这才是库尔班江的初衷。作为书的延续，他的计划是通过影像的力量，以最直观具体的形式，记录20位不同民族的新疆人的经历，讲述他们在祖国内地生活发展的故事。

“我讲的故事无关乎民族、宗教、地域，就是普通人的故事，他们在默默无闻地为国家作着贡献。”库尔班江说，身为纪实摄影师、职业摄像师，他用书和影像记录普通人的梦想和奋斗。

“如果出一本书，写100个人的故事，那影响力一定会更大吧”

在库尔班江看来，不少外国人对新疆的认识基本上限于旅游宣传，连一些内地人对新疆和新疆人的片面理解有时候都让他哭笑不得。“一次在电视台录节目，编导问我能否穿民族服装，我说你眼里的民族服装是什么？他们就直接给我上了跳舞的衣服，幸好没给我手鼓。我说生活中我不是这么穿的。”库尔班江说，有些维吾尔族学生到内地上学，他的同学甚至会问，你们上学是骑马吗？

“7·5事件”发生时，库尔班江正在兰州拍片，看到这个新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下来了，心里非常酸、疼。这不是几年时间能够恢复的”。

库尔班江有个一起长大的汉族发小，“小时候，我们天天打架，我跑步他也跑步，我练拳击，他也练，他练不好我就打他，那时我们都没有觉得谁欺负谁。我们一年不通话，但每次我回和田，他都会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他大学学的是维吾尔语，因为他觉得我汉语不好，需要用维吾尔语和我交流。”这段经历让库尔班江坚信，只要建立起一种长久的沟通方式，任何误解都会被消除。

库尔班江说，新疆和内地一样，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变化，库尔班江觉得该告诉周边的人现在的新疆是什么样子。

《我从新疆来》的选题早在3年前就有了。最初库尔班江想拍的是纪录片，拍10个人，每个人十几分钟，然后通过网络的方式传播，让大家看到一群真实的新疆人。“我想打破传统纪录片拍摄方式，用电影的概念、电影的手段来拍，但一算要600多万元。当时剧组也成立了，由于资金没到位，只好放弃了”。

纪录片暂时拍不成，库尔班江决定先做些前期采访，用图文方式展现在内地工作的新疆人的真实故事。他觉得最能改变人们看法的就是和自己同样勤劳上进的新疆人，“如果说少数人的错误做法可以破坏一个群体的形象，那么多数人的正确理解和积极行动更可以改善一个群体的形象”。

从2013年年底开始，库尔班江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追踪采访对象，并陆续在自己的微博中呈现。2014年4月1日，首发在网易《看客》上的图文专题记录了30个新疆人的故事，居然有了2500万次点击量。这么多人关注，证明大家迫切需要这个沟通交流的平台，这坚定了他的信心。“如果出一本书，写100个人的故事，那影响力一定会更大吧。”库尔班江想。

在接下来近一年里，库尔班江行程数万里，走访了20多个城市，采访拍摄超过500人，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新疆不能被极端的情绪笼罩。如果我们不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其他不利的声音和观点冒出，左右别人对你的看法，严重影响新疆人的声誉。我愿意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世人表达一个完整清晰的新疆。这是我的使命。”库尔班江说。

一开始，库尔班江先找了30多位身边的朋友作为采访对象，然后这些朋友不断介绍新的采访对象给他，“也有很多人直接拒绝我，说这样做没用。还有的人，反过来质疑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有意义吗？”库尔班江说，他曾一天飞过3个城市，有时候本来电话里头聊得挺好，但当他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对方却不接电话、不回短信了。

让库尔班江感动的是，大多数采访对象对他给予支持。书中最终确定的十几个民族的100个人中，年纪最大的92岁，最小的7岁。他交给库尔班江的文字中，有拼音、汉字，还有英语。库尔班江说，最长的录音资料整理出来近4万字，“故事太精彩了，我舍不得删，虽然只用了其中的5000多字，但我把它当成资料，以后有机会单独发表”。

那些日子，他形容自己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每天5点起床，凌晨一两点到家，一天睡4个小时都是奢侈的事。有时白天采访四五个人，晚上回到家整理照片和录音。“这本书是自述形式的。”库尔班江说，这些故事没有掩饰，没有刻意，只是真实呈现。

“看新闻时，新疆有时很远很陌生；看这本书时，新疆却很近很熟悉。这些图片与文字里，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这些故事出现在我们面前，本身就是改变。”库尔班江说，主持人白岩松写给《我从新疆来》的这段推荐语，是2014年7月的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发给自己的，他觉得这是看书的真实感受。

“新疆其实没那么遥远”

《我从新疆来》书中所选取的100个人，有科研人员、律师、演员、大公司的总监、留洋博士、钟情于音乐的医生、刚到内地工作的厨师、和田玉商人，还有设计了国内多个清真寺的建筑设计师、做了50多年维吾尔族音乐的汉族人……他们年龄、职业、人生经历不同，但他们都从新疆来到内地，默默融入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并且通过各自的努力拼搏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在纪录片《我从新疆来》的样片里，库尔班江讲了3个新疆人的生活和梦想：一个到北京跳舞的姑娘，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大叔埃里克，一个歌手帕尔哈提。“那个女孩每晚要跑3个场子，凌晨三四点才能下班回家。女孩打车，灯光闪烁的街头上，所有的车不是现实世界的车，都是慢速拍摄，只有她是真实的。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一样，所有的人都在路上……”在库尔班江的故事里，对命运的关注超越了民族和地域，“大家把‘新疆’两个字拿掉，你会发现我讲的就是最为普通的中国人的故事。我们也是中国公民，你所有的喜怒哀乐我们都有，我们这么努力生活工作，只是为了做一个和你们一样的普通人”。

有一次，库尔班江随摄制组到乌鲁木齐采访。有个导演没去过新疆，一路上都在说二道桥（乌鲁木齐维吾尔族聚居区）治安不好。库尔班江就把他们带到二道桥，然后拿走了导演的手机和钱包，让她自己回酒店。导演后来自己找了个维吾尔族黑车司机，说钱包、手机被人拿走了，安全送达后再付钱。司机二话没说就把她送回了酒店，却一分钱没收。

这些年，库尔班江慢慢影响着身边的人，之前不敢去新疆的，现在也敢去了，有误解的也开始改变了态度。

“乌鲁木齐是二线城市，可年轻人看到的东西和想法跟北京上海也差不多。你去那里一看，哇，姑娘也穿得好时尚啊，也有很多国际范儿的乐队。像我这样的30岁左右的年轻人都在行动着，他们愿意做事情，也愿意出来发展。”库尔班江说，我们都是同样的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家庭与梦想在奋斗。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也只是长相不同、语言不同、饮食习惯不同，“新疆其实没那么遥远”。

来北京快9年了，库尔班江早已习惯了内地的生活。在单位，也没人觉得维吾尔族的他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刚开始工作那会儿，生活上是有些不方便，但大家都很照顾他，经常是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出差，为了他一个人到处找清真餐厅。“我要求吃汉餐，他们说，别开玩笑，再找找。”但他坚持进汉餐厅，经常是一份炒西红柿鸡蛋、一碗米饭搞定。

“尊重是你自己赢得的。我所拍摄的这些新疆人，他们都活出了自己的自尊。别忘了，我们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一，不是客人。”库尔班江希望书中的100位新疆人的100个故事能形成一股榜样的力量带动更多的人，“我书中的人物都有包容、勤奋、勇敢、自信的特质，这才是新疆人普遍的品质”。

“越努力才会越幸运，越勇敢才能有改变”

作为《我从新疆来》里第101个故事的主人公，库尔班江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了序言里。他的故事，就是“维吾尔北漂”的励志故事，有辛酸，更有满满的正能量。“我拍摄别人，其实是在拍摄自己；讲述别人的故事，也在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库尔班江说，这个过程当中，被采访者的很多故事他都经历过。

“越努力才会越幸运，越勇敢才能有改变。”这是库尔班江为他的书总结的“中心思想”，但前提是要勇敢地走出来。“我从和田走出来，扛起了摄像机，我一直在努力，但这个机会在哪儿那时候我不知道，当我踏踏实实做我自己的时候，这个机会自然而然就来了。”

和田是新疆传统的维吾尔族地区，但改革开放不久，库尔班江的父亲因为做玉石生意开始频繁跑内地，回来后，经常给孩子们讲他遇到的人和事。父亲说：“你们是男孩，一定要出去看看。”在库尔班江的记忆里，父亲的故事几乎都跟教育、知识、上学有关。他常说：“肚子里面没有墨，你怎么能写出字来？”库尔班江记得小时候搬过3次家，每次都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直到周围住的都是“文化人”，“我们不逃学了，学习也变好了，因为周围的小孩都在上学”。

父亲曾因生意失败而离家4年里，库尔班江支撑起家里的重担，把弟弟妹妹送去上学。他摆过摊，卖过烤肉，做过玉石生意，面对艰辛生活始终乐观、阳光、幽默，外出时总随身带着相机，拍摄吸引他的人文景象，直到遇到后来成为他干爹干妈的央视导演孟晓程夫妇。2002年，孟晓程夫妇到新疆拍纪录片，也正是那次偶遇，他们将一个喜欢摄影的维吾尔族小伙子带进了纪录片行业。“孟晓程把我当成儿子，教我怎么做人，他希望我成为一个‘世界人’，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维吾尔族人、新疆人以及中国人。”库尔班江说，后来他慢慢理解了“世界人”的意思，“视野宽了，心胸也会宽”。

库尔班江说，2009年毕业后，他和一个朋友在北京合租房子住。毕业第二年，一整年他都没有什么活儿，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一年后才有了《时·光》，然后是《牦牛》《自然的力量》，从此以后就再没闲下来。

“低潮的时候我也想过放弃，但最后我还是撑下来了。”在库尔班江看来，人的潜力是通过自己逼自己挖掘出来的，“当年打拳时伤到的左眼在12年后和我开了个玩笑，在我出现一些青光眼的症状时，刚好接到了一个去国外拍摄的任务，因为不想耽误整个团队的工作，一咬牙还是去了。结果在高原拍摄时，左眼视网膜脱落、穿孔，看什么东西都是黑的，只好戴了个眼罩，以‘加勒比海盗’的造型继续工作。回来后被医生骂，说你是不是不要眼睛了。”一直以来，库尔班江的状态都是“蛮拼的”，“我是一个喜欢找困难困住自己的人，然后享受那种使劲挣扎最后破茧而出的喜悦”。

2006年8月，库尔班江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北京传媒大学学习纪实摄影。在学校，他是名副其实的“蹭课大王”，哪个系的课都听，永远坐在第一排，课上问题最多。“他们的课我都追着听好几遍，有的老师都‘烦’我了，因为他们要说的每一句话和案例还有要放的片子我都门儿清。”库尔班江笑道，其实那是因为当时自己汉语基础不好，必须一遍一遍听才能懂。直到现在他还留着当时的笔记，一共七八本，汉字、拼音、维吾尔语三合一。

“北京是个竞争多大的城市啊，能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拍纪录片的，所以如果我不比别人付出更多倍的努力，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我也被打击过，比如架上机器完全不知道该拍什么，当时导演就说‘你不适合拍纪录片’”，又是师傅一句“特别霸道的话”救了他，他说：“我说你是个好摄像，你就是个好摄像！”

但库尔班江又特别幸运，这些年得到了不少“贵人”相助。和干爹干妈一起拍片，第一部参与的就是中国首部商业自然类纪录片《森林之歌》，“拍片的起点很高”，第一次当摄像就是航拍。而且，这部片子的总导演正是师傅王路的师傅、《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后来，陈晓卿成了库尔班江的“师爷”，带着他拍了很多纪录片，其中就包括《舌尖上的中国2》。

和作家王蒙的忘年交也让库尔班江受益匪浅。有过16年新疆生活的王蒙对新疆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喜欢新疆，也惦记新疆，可是最近老是从报纸上看到关于新疆让人不舒服的一些事，这样的话甚至让很多人很紧张，不知道这新疆怎么了。”王蒙说，库尔班江那么年轻，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接受什么特殊使命，但是他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

《我从新疆来》英文版首发后，得到海外出版界的广泛关注，该书日文版正在翻译过程中，按照计划，阿拉伯文版的首发式将于今年秋季在埃及举办，土耳其文版的版权签约仪式也已提上日程，“这本书的维吾尔语翻译工作已经结束，顺利的话8月下旬就可以出版了”。

“新疆那片土地给予了我们不断努力、学习进取的性格，现在的生活和社会给了我们非同寻常又无奈的选择和经历，但我们的心胸就像新疆的那片土地一样大。”关于未来，库尔班江并不说“期待”。他说，期待越高，失望越大，最重要的是每个人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社会也是一样，“现在就连生活、工作各个方面遇到的挫折，也觉得是幸福”。

但风风雨雨一路走过来，库尔班江始终坚信有了理解就不会有误解，“你心里面想着什么，你才能遇见什么。只要心中充满阳光，就一定能见到阳光。和田和新疆还有我们这个国家，都是一天比一天好，因为我相信光明战胜一切。”库尔班江说。

拉萨火车站。

拉萨火车站，一名戴耳机的男孩在候车。

从拉萨开往日喀则的z8801火车上，一名藏族列车员在表演舞蹈节目。

拉日铁路于2011年1月开工建设，2014年8月15日开通运营，该条铁路连接拉萨与西藏自治区第二大城市日喀则，全长251公里，是青藏铁路的首条延伸路段。铁路地处青藏高原西南部、西藏自治区境内，东起青藏铁路终点拉萨站，向南沿拉萨河而下，途经堆龙德庆县、曲水县，折向西溯雅鲁藏布江而上，穿越近90公里的雅鲁藏布江峡谷区，经尼木、仁布县后抵达藏西南重镇日喀则，全线设拉萨南、曲水、日喀则等14个车站。据一名列车长介绍，以前从拉萨到日喀则没有火车，开汽车需要六七个小时，而自拉日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拉萨到日喀则只需3个小时。

本报记者　赵　迪/摄

穆热阿勒：弹起我心爱的冬不拉

本报记者　桂　杰
实　习　生　蔺壮壮

穆热阿勒，哈萨克族人，中央民族歌舞团唯一的冬不拉独奏者，中央民族大学2009级冬不拉专业的学生。4岁时，父亲给他人生的第一把冬不拉，没想到这一弹，就是20多年。

“最开始，只是作为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在逢年过节时给家人助助兴”。17岁以前，冬不拉只是穆热阿勒众多音乐爱好中比较重要的一个。5岁时，父亲给他买了一部电子琴，穆热阿勒开始在少年宫中系统地学习乐理知识；13岁，上初中的他又迷上了摇滚乐，开始学吉他，并组建了一个乐队。

17岁，对穆热阿勒而言，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系统地接受冬不拉演奏培训。2009年高考，他考取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冬不拉专业。就这样，这位新疆小伙子来到了首都，开始他6年的“北漂”生涯。

来到北京，穆热阿勒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人们对于冬不拉这种乐器了解太少，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种乐器的存在。“我们是民族大学第一届冬不拉专业的学生，有点小白鼠的性质”。穆热阿勒笑着说。在大学的学习，与其说是老师的讲授，不如说是老师和学生一起摸索、进步。相比于其他音乐专业学生，冬不拉专业的学生显得有些“默默无闻”。“有时候一年才能有一次演出的机会”。

既然没有演出来找自己，那自己就出去找演出。穆热阿勒坦言，自己大学的很多时间都是在酒吧里面驻唱。当然，驻唱也不是一帆风顺。由于冬不拉乐器的低知名度，他不得不换用吉他才能找到驻唱的工作。“可能十几次演出，只有一次是拿着冬不拉去的，迫于生计，只能拿着其他乐器来养活自己喜爱的冬不拉。”穆热阿勒说。

但是，这激发起他想要改变传统冬不拉演奏风格的愿望。在驻唱期间，电子、摇滚、流行……对他的演奏风格产生了影响，使得他的乐曲风格融入了许多现代的元素。曾经与穆热阿勒合作过的音乐人这样评价道：“把冬不拉弹成了吉他，把吉他弹成了冬不拉”。“这个评价听起来挺好笑的，后来发现，这就是我想要的风格”。

随后，他与同学一道，组建乐队Khorgan（霍尔甘）。Khorgan是哈萨克语“堡垒”的意思。穆热阿勒在乐队中既是主唱、吉他手，还要负责乐队的冬不拉演奏。在乐队成立之初，穆热阿勒就希望乐队风格能以哈萨克民族传统民乐为主，加入摇滚、电子等现代元素。在他看来，“传统是需要保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恪守传统，停滞不前。时间在向前走，人也在向前走，那么音乐也需要跟着这个步伐”。只有这样，音乐才能不断地传承下去。

在大学毕业后，穆热阿勒选择留在北京继续他的音乐创作。他说，留在北京是一个“纠结”的决定。北京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处在一个快节奏上。这让穆热阿勒觉得他的心变得越来越浮躁。“刚毕业的时候，急着想要拿出好的作品，如果在短期内拿不出自己的作品，很快就会被淘汰，不演出，就没有人知道你。”但是心急反而拿不出作品。在穆热阿勒看来，创作的整个过程需要“沉下心去做事”。

为了挣够房租，他选择每天都去酒吧驻唱。“每去一次，能挣300元驻唱费”。慢慢地，“我发现自己掉进了‘钱眼儿’里，怎样能挣到钱，就怎样做”，原本挣钱为更好地创作变成创作为更好地挣钱。但是另一方面，北京完善的音乐市场体系以及众多资源，让穆热阿勒选择留在北京。

如今，穆热阿勒已经在中央民族歌舞团工作了一年多。“这里可能是一个适合我的地方，至少不用再为生计发愁，能安心创作了”。在这一年中，他随团参加演出，将冬不拉的乐声传递到世界各地，也将国际上的流行元素以及其他国家民族的传统乐器如非洲鼓等加入到自己的演奏中。在业余时间，除了乐队的排练，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冬不拉，他还开设了北京首家冬不拉专业培训班。“虽然来的人很少，但是我一直坚持做这个，只要想学，我就会教。”

穆热阿勒希望尽力为传播哈萨克民族自身独特的文化作出贡献。“虽然我想得可能有点大。”穆热阿勒说。